

# 委员眼中的2021年中国经济前景

5—6版

## 房爱卿:充分发挥外贸外资在双循环中的重要枢纽作用

本报记者 崔吕萍

“2020年,在全球贸易投资大幅萎缩的情况下,我国外贸外资逆势增长。2021年既有发展机遇,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。”围绕这一话题,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商务部原副部长房爱卿提出4点建议。

一是保持稳外贸外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,加快形成自主可控的全球产业链。在房爱卿看来,为应对挑战,许多国家采取了超强经济刺激政策,比如越南对外资税收实行“4免9减半”政策,加上3年适应期,等于是“7免9减半”。近一段时间,企业经营成本不断上升,国际海运运费

大幅上涨,沿海地区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工人短缺问题突出。

为此,房爱卿建议,国家出台的稳外贸外资政策应保持稳定性、连续性,同时中西部和东北应营造更好的环境,出台更有力的政策,承接东部产业转移;对转移到东南亚等区域的企业,加强引导,主动塑造与国内相连接的产业链,逐步提升自主可控能力。同时,加快跨境物流和海外仓建设。

二是统筹谋划,突出重点,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。目前我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

个自贸协定,我国对外开放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。但与国际高标准自贸协定相比,我们仍存在一定差距,因此,房爱卿建议,在积极支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的同时,也应分类研究我国与各大区域国别经贸发展潜力、达成自贸协定的可行性,统筹谋划自贸区网络布局。

三是加快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,按照高标准规则进行压力测试。房爱卿建议,可以选择海南自贸港和一些发达地区自贸试验区进行压力测试。从目前自贸试验区情况看,已向知识产权、环境保护、人才管理、劳工权益等新议题拓展,已形成一批经验。在符合自身需要

基础上,进一步提高标准,先行先试,加大改革力度,加快制度创新,营造高水平的市场化、法治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。

四是打通内外贸之间的堵点,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。内外贸一体化的关键是在法规体系、管理体系、技术体系、市场体系衔接基础上,做到同线同标同质。房爱卿建议,重点解决动力问题,缩短国内付款期,给予政策扶持;解决便利问题,缩短认证认可时间,改革相关制度,简化手续;解决模式问题,鼓励发展市场重组、战略合作、平台对接等多种模式。

## 把制造强国建设摆在“十四五”发展突出位置

苏波

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,“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,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”。这是工业领域今年和“十四五”时期的中心任务。为切实落实好中央决策,提4点建议。

第一,坚持底线思维,完善政策策略,坚决将制造强国战略落地落实。制造业增加值占我国GDP比重,在多年连续下降至2016年的29.0%后,2017年、2018年回升至29.3%、29.4%,2019年又降至27.2%。目前,中美博弈态势与3年前发生重大变化,我们不能抱有幻想,应当理直气壮应对。建议尽快调整我方策略,旗帜鲜明推进制造强国建设,按照中央部署,尽快出台《制造强国建设中长期规划》,发挥我组织动员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制度优势,努力完成2025年进入全球制造强国第二阵营的目标。

第二,着力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,大力推进新技术新产业发展。

一是要不断完善我国制造业创新体系,持续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,推动形成以关键技术为引领、以企业为主体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;二是加快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发展,促进产业数字化、数字产业化,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5G+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,大幅提高制造业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水平;三是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

业,加快发展无人驾驶汽车、先进工业机器人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区块链、人工智能、5G、新材料、生物技术、量子计算与通信等前沿技术与产品,不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。

第三,大力提升制造业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。

“十四五”要系统研究建立产业救济机制和相关政策保障,针对疫情后引发的全球产业链调整动向,采取措施延缓和阻滞重要产业链过快或整体向外转移,加快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向中高端提升。

第四,积极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。一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,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,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,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;二要规范化解产能过剩,对新能源汽车、集成电路等新领域盲目投资、地方政府以土地矿产资源低价配置招商引资造成许多“烂尾工程”和资源浪费等问题,进行规范和整治;三要推进制造业优质、高效、绿色协调发展,持续实施重大技术改造提升工程,大幅度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,持续推进绿色制造,培育发展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著名品牌和产业集群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工信部原副部长)

## 肖钢: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

本报记者 崔吕萍

“2020年,党中央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,取得了战疫情、稳经济、保民生的巨大成就,确保了‘十三五’规划圆满收官。‘十四五’期间,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,因此要坚持系统观念,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,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。”在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看来,由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,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新的变化,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,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,这些都给宏观调控的时度效带来新的挑战。

面对多重目标与多重问题相互交织,肖钢表示,有必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——既要增强逆周期调控能力,又要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,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,在着力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,着眼于中长期发展问题,平衡好各方面任务之间的关系。同时,在国家规划指导下,处理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,统筹协调好就业政策、产业政策、竞争政策、环保政策、区域政策等各种政策工具,实现“十四五”高质量发展。

“疫情防控期间,许多国家富人消费降低、储蓄增加,而穷人失业、收入减少,所以,富人比穷人恢复得更快更好,这种不平衡的现象确实存在。从我国情况看,多年来,资本、劳动、土地等要素相结合,创造了大量财富,但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

收入的比例在下降,贫富差距扩大。这些不平衡的现象说明,需求侧成为一个短板,供大于求的问题显现。因此,注重需求侧管理也是‘十四五’期间的发力点。”肖钢这样说。

他同时认为,需求侧管理除了消费还涉及扩大投资,这是必要的。但过度依靠扩大信用规模来投资效益不好,特别是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公益性的,项目本身没有足够的现金流,结果是债务高企,未来的偿付能力受到影响,同时对GDP的拉动也越来越少。因此,要逐步改变过去更多依赖负债驱动型投资扩张,盘活资产存量,提高投资效率,拓展投资边界。对老思维、老模式的改革,是需求侧管理的重要内容。

## 全产业链优势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

何文波

2020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金额为10.66万亿元,较2019年增长了6%。事实表明,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,不仅没有导致产业链从中国向国外大规模转移,相反更加凸显了中国产业链的强大优势。这既是“六保”“六稳”等政策措施综合作用的结果,也表明我国产业链具有稳固的产业基础优势。

我国的产业链优势体现为如下五个方面:一是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行业的国家,拥有全球规模最大、行业最全、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;二是我国具有强大的工业产能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,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,我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,而且各个主要产业均具有产量规模居世界前列的大型企业集团;三是产业链的高效运行需要仓储、运输、信息等要素支撑,我国在物流体系、信息技术、大数据技术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,保障了产业链的畅通运转;四是我国产业的区域布局合理,许多省市都已形成了面向世界市场的各类产业集群,成为国内产业链体系的重要节点,亦延伸融入国外的产业体系当中,国内外产业链形成良好的互动、互助、共赢的合作局面;五是国内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,对国内各产业链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,而且需求端与供应端初步形成良好的内循环格局。

同时,我国的产业链建设尚处在持续现代化的过程中,产业链的产出结构亦在持续优化。如2020年我国钢材出口5367万吨,同比下降16.5%。但是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量却有较大幅度增长,特别是机电产品中含钢工业品出口量的大幅增长,意味着有更多钢材通过含钢工业品出口实现了间接出口。从价值链的角度看,钢材转化为更高价值产品,表明我国产业链综合产出价值、产出效率得到了提升。但是要看到,我国产业链还存在一些短板。一是铁矿石、石油等基础资源需要大量进口,资源保障存在隐忧;二是制造业中的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及零部件尚存在不足,制约产业链现代化进程。

因此,我们还要坚定不移地进行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,巩固传统产业优势,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,最终促进中国产业链价值产出效率的提升,打造中国产业链不可复制的综合优势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)

## 需求管理 稳字当先 着眼长远

——中国经济怎么看之四十一

杨朝英

上周,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国民经济发展初步核算结果。全年GDP实现同比增长2.3%的好成绩,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。

从趋势上看,从2020年一季度的负6.8%,到接连三个季度实现3.2%、4.9%、6.5%的增长,中国经济走出了一条漂亮的增长曲线。

从结构上看,2020年GDP构成中,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增长2.2%,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增长0.7%,消费向下拉动0.5%。

有分析人士据此提出,2021年要突出重点,加大刺激消费力度。

近一段时间以来,鼓励购买汽车之类耐用消费品的政策也开始推出,似乎验证了这一观点。

这个观点与行动,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“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”一脉相承,并无不妥。但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,内需是战略基点,要着眼长远寻求根本性改善,不能因求一时之利用力过猛。

这既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必然要求,也是内在经济规律使然。打个比方:

一国经济,就像一个家庭。家长是供给方,三个孩子是需求方,性格

各不相同。老大叫投资,比较孝顺,家长给的东西,自己只吃掉一小部分,其余部分过段时间再还给家长;老二叫消费,比较乖巧,日常变化很小,只有家里条件好些,才会改善一下;老三叫净出口,比较叛逆,情绪不稳,喜欢听外人的话。

老大老二又叫内需,老三叫外需。根据三兄弟秉性,政策侧重点也各不相同。投资,强调有效性;消费,强调长远性;净出口,强调稳定性。

我们注意到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,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,必须在合理引导

已明显下降,通过负债扩大投资还会增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潜在风险。事实上,2015年以来,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稳定在60%左右,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。然而,我们在引导和扩大消费方面,办法不多,采取的措施效果也不甚明显。消费恢复滞后,最终会传导到生产领域,从数据上看,企业库存和应收账款都在增加。

那么,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?王一鸣表示,建议把扩大消费作为宏观调控和需求侧管理的重点,研究出台促进消费的一揽子政策。短期来看,一是要稳定大宗消费。汽车消费已经开始反弹,要顺应这个趋势,推进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,并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;二是要顺应“90后”“00后”逐步

成为消费主力军的趋势,鼓励发展新消费业态,促进新型消费扩容提质;三是控制好房价和居民部门高杠杆,避免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。“90后”是消费的主力军,也是购房的主力军,如果每月房贷压力很大,就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。”王一鸣补充道。

“短期的刺激政策随着经济回归常态往往会带来后期的消化压力。”王一鸣认为,扩大消费应更多依靠改革和制度性安排,比如,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,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;简化社保参与、转移、接续等手续,加快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;深化户籍制度改革,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,这样才能形成有效扩大消费的内生增长机制,释放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。

消费、储蓄、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。“有效制度安排”,要比一时的政策稳定性要强,也更着眼于长远。

其中,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,完善社保,优化收入分配结构,扩大中等收入群体,扎实推进共同富裕。

从数据上看,很多方面,成绩斐然。比如,2020年新增城镇就业1186万人,明显高于9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,这为改善民生、提高消费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再比如,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和餐饮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由三季度的负5.1%和负6.9%,转为正增长2.7%和2.2%,说明消费恢复的潜力不小。

也有一些方面,需要付出更大努力。比如,居民收入增长从年初的负3.9%,到四季度的2.1%,虽然逐季好转,实现了与经济同步,但提升空间,无疑也不小。

## 切实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职责

周廷礼

当前,我国金融服务业经济仍有空间,创新能力仍显不足。着眼全局,金融业要切实履行好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职责。

一是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。优化融资供给结构,围绕“制造强国、质量强国、网络强国、数字中国”建设,以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资金需求比重为重点,聚焦新基建、5G网络、科技创新、数字经济,进一步研究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金融措施。

二是延续小微企业金融政策支持。持续改进和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,进一步疏通货币信贷传导机制,发挥信贷保险融合服务功效,促进降低中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。

三是继续不断地聚焦扶贫、养老、健康、医疗等金融保险服务薄弱环节,调动各类金融资源,支持消费升级和民生改善。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“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”要求,发挥商业保险机构的作用,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等转型发展。

立足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,切实发挥金融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方面的作用:一是重点构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金融,全面服务于畅通国内大循环,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,推动形成

双循环新发展格局;二是构建国内金融大循环,进一步扩大有效的金融需求,形成生产、流通、分配、消费互联互通的金融服务体系,做到金融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;三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,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。要围绕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京津冀协同发展、长江经济带发展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,构建与国际贸易、国际投资和吸引外资来华投资的大循环体系。

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,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、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持。建议:一是要对产业的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转型提供全方位支持,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;二是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不断创新出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,构建满足创新型企业发展需求,促进科技、资本和产业紧密融合的金融服务体系;三是支持绿色经济发展。一方面,国家层面出台支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专项政策;另一方面,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要明确对绿色信贷、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的政策要求,并进一步细化实施准则,可重点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强制实施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、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)

## 央企将以深化改革作为不竭源泉

徐福顺

2020年,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有4个突出特点。

一是经济效益先降后追,全年实现了正增长,好于预期。一季度困难重重,3月份和4月份开启触底回升,6月份实现了正增长。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.4万亿元,同比增长2.1%。

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稳步增长。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.9%,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1.3%,为今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三是有效防范了财务风险,降杠杆目标圆满完成。2020年末央企平均资产负债率64.5%,同比下降0.5个百分点,带息负债比率37.7%,同比下降0.6个百分点,负债结构明显改善,偿债能力增强,守住了不发生债券违约风险的底线。

四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,努力助企纾困,为全国的复工复产作出积极贡献。央企坚持算大账、算长远账、算政治账,坚决落实国家政策,降或免电价、气价、路费、房租等近2000亿元,降低全

社会运行成本。

2021年,中央企业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,以深化结构性改革为主线,以改革创新为动力,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,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,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、实现“十四五”良好开局作出应有贡献。根据各央企的工作思路,我们要对中央企业2021年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。中央企业将以自主创新、自立自强作为强大动能,以深化改革、激发活力作为不竭源泉,以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作为坚实基础,勇于担当,奋发有为,能够全面完成发挥优势带动构建新发展格局,强化企业创新主体意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,抓紧抓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、着力打造提质增效升级版,加快国有资本布局 and 产业结构调整,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,进一步提高国资监管效能,主动服务和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等重点任务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)